

三
唐
詩
選

三曹詩選

余冠英選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前 言

建安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是在文人詩的傳統裏，是一個很突出，很輝煌的時代。鍾嶸『詩品』說：

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文淩，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一九六年起到二一九年止。不過文學史上所謂建安時代大致指漢末魏初，並非嚴格地限於這二十四年。

● 指王褒、楊雄、枚乘、司馬相如，都是西漢的賦家。

● 『詠史』是最早的一首文人的五言詩，寫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

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這時文學的主要體裁已經從辭賦轉變為五言詩，而作家之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又說：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說明了建安文學不同於兩漢作家『王、楊、枚、馬』所代表的以歌頌帝王功德為目的，以諷諭鑒戒為幌子的文學，而是有感情有個性的抒發性的文學。也不同於班固『詠史』那樣『質木無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質相稱的文學。這些都是顯著的變化，尤其是從頌揚鑒戒到抒情化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上面所引的鍾嶸和沈約的話雖然簡單，可使我們感覺到建安時代是一個文學史上的新時代。

在這個文學新時代活躍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就是上引『詩品序』所說的『曹公父子，平原兄弟』。『七子』是曹丕『典論·論文』所評述的七個作家^②，『詩品序』提到的劉楨、王粲便是其中的冠冕。七子在政治關係上是三曹的僚屬，在文學事業上是三曹的『羽翼』（其中孔融稍不同，請參看註二）。當時三曹在文學上和政治上一樣是處在領袖地位的，他們的

文學才能和實際成就也配得上這個地位，其中的曹植尤其是歷來公認的當時最優秀的作家。

建安詩篇流傳下來的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詩最多（約八十首），其次是曹丕（約四十首），再其次是王粲和曹操（各二十餘首）。詩人的作品保存下來或多或少，可以有種種原因，但其質量是否禁得起時間淘汰往往是主要原因之一。從現存建安詩的質量看來，曹王四家也正該排在建安詩人的最前列。由於三曹在當時詩壇的領袖地位，由於其作品成就較高，留存的又較多，便自然地成為後人研究建安詩的共同時代特徵的主要資料。因而他們的代表性也就較高於同時的作家。這就是三曹（主要是曹植）詩在建安作品中值得我們首先注意的原因。

◎ 兩漢典型的賦都是鋪寫帝王的生活和功業，目的在娛悅和歌頌帝王，但往往在末後加上諷諫的尾巴。

◎ 這七個作家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其中孔融年輩較高，死得較早（建安十三年被殺），不在鄴下文人集團之內。

曹操生於一五五年，卒於二二〇年。他的父親曹嵩是漢桓帝時宦官曹騰的養子，『三國志』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可見得他的先世在社會上地位是不高的。曹操二十歲舉孝廉，在靈帝朝曾因『能明古學』被任命為議郎。又曾以騎都尉的軍職參加鎮壓黃巾起義。獻帝初，地方『豪右』起兵討董卓，曹操因陳留人衛茲的資助，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討董聯軍。後來因為收編青州黃巾三十餘萬，實力雄厚起來，便成為『逐鹿中原的『羣雄』之一。等到他擊破了他的最大競爭對手袁紹之後，就以『相王之尊』挾天子令諸侯，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和袁紹屬於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的社會階層。袁氏四世三公，是所謂士族大家，屬於東漢最有權勢，社會地位最高，一向把持政治的大官僚地主階層。曹氏出於地主階級裏的小族，袁紹曾罵他『贅闇遺醜，本無懿德。』●這個階層在東漢末葉纔開始走上政治舞台，成為新興的勢力。（黃巾起義削弱了上層士族地主階級的統治力量，相對地造成了下層非士族地主的抬頭的機會。）

曹操和袁紹雖然同屬於和農民相敵對的階級，他們對農民的政策却有顯著的歧異，袁氏要維持其本階層固有的特權，『使豪強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曹操『抑兼併令』）而曹氏則採取壓抑豪強，對農民讓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併。這種歧異也反映兩個階層的矛盾^①。曹操對於當時的社會形勢有清醒的認識，深知黃巾軍雖被鎮壓下去，農民的反抗力量仍然是不可輕視的，唯有採取對農民讓步的政策纔能緩和階級鬥爭，也唯有如此纔能使得被他收編的農民武裝真正為他出力。因此他的政治措施在當時軍閥中是比較開明的，所以能戰敗強敵，統一華北，使多年極度混亂的社會安定下來。他的法治主義和屯田制度是有力的武器，這些都可視為對士族地主勢力的摧抑，抑止兼併不過試罵很使曹操難堪。

- 見於陳琳代袁紹所作的檄文。這篇檄文歷敍曹操的三代，見出當時人對於門第家世的觀念。後來陳琳降曹操，曹操責問他道：『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乎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可見這種取招撫政策。
- 這種歧異又表現在對起義農民的政策上，袁紹對起義農民一貫屠殺，曹操對青州黃巾，對張燕，張魯都採取招撫政策。

是最露骨的罷了。

正因為曹操對農民既有新的鎮撫，對曾被農民運動所削弱的舊豪強勢力又予以新的打擊，於是他的新的統治勢力便壯大和鞏固了，他對於舊統治階層的傳統也就不予尊重。他在政治設施和文學傾向上都表現為一個反對兩漢傳統（也就是反正統）的人物。他的『求賢』、『舉士』、『求逸才』諸令強調用人唯才，便打破『經明行修』這一個傳統的仕進標準，其目的就在打破家世門第的限制，從各階層提拔人才。這樣就摧抑了士族地主的特權，而擴大了非士族地主階層的勢力。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魏志：荀彧傳』引『魏氏春秋』），他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其次就是文學之士。照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的情形看來，曹操對當時四方知名的文士竭力收攬，幾乎網羅無遺。文學人才的大量集中就是造成當時『彬彬之盛』的條件之一。由於一般文學之士本身原是非士族地主，曹操的政權正代表他們的利益，同時對於願意和曹氏合作的少數士族地主出身的文士，曹操也竭力籠絡，因而曹操對待文學之士就自然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他們當作倡優來畜養，而是使他們成為國家的官吏，如王粲所稱頌的『置之列位』。

『宋書：臧燾傳論』道：『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分析儒家經籍的章節句讀就是漢朝的經術，經術本是名門世家士族地主的傳統，也是維持舊統勢力的一種工具。到東漢末年，它隨着舊統治勢力的衰微而衰微，到新興勢力曹氏政權鞏固之後便普遍地無人過問，而完全被文學所代替了。

曹操自己的文學路線和寫作態度對於其他作家起更具體的領導和倡導作用。『文心雕龍：時序篇』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三國志』注引『魏書』說他『登

●『求賢令』道：『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鈞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求逸才令』道：『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貳也，皆用之以興。……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或堪爲將守，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入荊州後辟王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王粲稱頌他道：『及平江漢，引其賢能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三國志：王粲傳』）可見王粲對於這種待遇是很滿意的，可以代表當時非士族文人的心理。

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曹操的文學事業就是樂府歌辭的製作。他本是多才多藝的人物，他愛好音樂，自己也是這方面的行家。『魏書』說他『倡優在側，常日以達夕。』他所愛好的音樂是本來產生於民間的相和歌。他自己就在這些樂府民歌的影響之下寫作了許多歌辭。現存二十幾首他的詩中全部是樂府歌辭，大部份運用出於樂府民歌的五言體和雜言體。

曹操的樂府詩是用舊調舊題寫新內容。『薤露行』和『蒿里行』以挽歌寫時事，前者敍何進誤國與董卓殃民，後者寫羣雄私爭使兵災延續。這兩首批評政治，敍寫現實的詩被後人稱為『漢末實錄』，稱為『詩史』。作者敍董卓焚燒洛陽，居民被驅入關的情形道：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薤露行』）

敍當時兵禍的慘狀道：

鑽甲生蟻蟲，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

里行』）

這些詩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喪亂時代人民的苦難。

曹操在『對酒』篇裏描寫了理想的太平時代。他想像那時候執政的人都能像父兄子弟一樣地愛護百姓，但是賞罰嚴明。社會上都講禮讓，沒有爭訟。農民安心地從事農業，不必奔走四方，人人過着和平豐足的生活，終其天年。作者在這裏所表現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但曹操在具體的設施和作風上則顯出濃厚的法家色彩）。在『度關山』篇強調正刑和節儉，反對『勞民爲君』，和『對酒』篇的意思大致相同。『短歌行』（『周西伯』篇）歌頌周文王，齊桓公和晉文公。作者以這三人來自比，說明自己尊奉漢室，謹守臣節，如文王之事殷，桓、文之尊周。這是表明政治態度的詩。作者本是一個政治家，爲了了解他的思想，這一類作品是可注意的。

●『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又云：『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謡諺，「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又云：『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

●明代人鐘惺評曹操『蒿里行』云：『漢末實錄，真詩史也。』『唐書』說杜甫的詩『善陳時事……世號詩史。』是『詩史』這個詞的來源。

抒情成分比較多的詩以『苦寒行』、『却東西門行』、『龜雖壽』（即『步出夏門行』第五章）、『短歌行』（『對酒當歌』篇）這幾首最被人傳誦。前兩首寫行軍征戍的痛苦和懷鄉戀土的感情，是和樂府民歌情調相近的五言詩。『龜雖壽』的正文有十二句：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寫有志進取的人雖然知道年壽有限而雄心壯志不爲之減少，且不信成敗天壽全由天定，認爲人力也可以有所作爲。這種積極樂觀的精神是很可貴的。晉朝王敦常在酒後吟詠『老驥伏櫪』四句，用如意敲唾壺來打拍子，壺口都敲缺了。（『世說新語：豪爽篇』）這首詩因爲道着一個人生普遍的矛盾，引起讀者深沉的感慨，又因其積極樂觀，終於令人精神奮發，難怪它是這樣地膾炙人口了。

『短歌行』也是四言的名篇。開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現這個喪亂時代人人容易感到的『人生無常』的苦悶。但作者的思想並不是消極頹廢的，祇消玩味結尾『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四句便覺察到作者的積極感情。作者在『秋胡行』（『顧登』篇）有兩句詩道：『不戚年往，憂世不治。』

可以說明這種感情。

鍾嶸『詩品』曾指出曹操『頗有悲涼之句』。上文所舉各詩有不少的句子是頗爲『悲涼』的，可見作者感慨很多，但是這種感慨却是和對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對豐功偉業的追求緊密結合着的。曹植有詩道：『烈士多悲心』，曹操的感慨就是所謂烈士的悲心吧？本來一個上升階層作家的慷慨悲歌和沒落階層的感傷是大異其趣的，我們玩味這個區別，對於了解建安詩歌的精神將會大有幫助。

曹操又被人稱爲復興四言詩的作家，因爲『詩經』以後四言詩很少動人的作品，到曹操纔有幾篇佳作。除了上面所舉的，還有一首『觀滄海』（即『步出夏門行』第二章），這首詩氣魄偉大，想像豐富，是描寫自然景物的名篇。完全寫景的詩在這以前還不會有人作過。曹操的四言詩之所以成功，因其具有新內容、新情調，句法、詞彙也不模仿『三百篇』，不像過去傅毅、蔡邕等人所做的祇是『詩經』的仿製品。但真正代表曹操創作的新傾向，產生影響，成爲當時主要文學形式的却是那些樂府民歌化的色彩更顯著，語言更通俗的五言詩。我們說曹操的文學傾向是反正統的，主要的一點是在詩的創作上擺脫了古典的束縛而從民間文學吸取營養，換句話說就是詩的民歌化。這一特徵在他的五言

第一部份 曹操詩八首 曹丕詩二十首

度關山

三

薤露行

三

蒿里行

四

對酒

四

短歌行

五

苦寒行

六

步出夏門行

六

却東西門行

八

(以上曹操詩)

鈎竿

九 九

短歌行

九

燕歌行	二首	10
秋胡行		1
善哉行	二首	1
丹霞蔽日行		1
上留田行		1
大牆上蒿行		1
豔歌何嘗行		1
煌煌京洛行		1
芙蓉池作		1
於玄武陂作		1
雜詩	二首	7
清河作		8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8

代劉勳出妻王氏作二首

(以上曹丕詩)

第二部份 曹植詩五十一首

箜篌引

三

薤露行

三

鰣鮋篇

四

吁嗟篇

四

豫章行 二首

五

浮萍篇

六

當來日大難

七

野田黃雀行

八

門有萬里客行

九

泰山梁甫行	元
怨歌行	元
精微篇	六
桂之樹行	元
當牆欲高行	元
名都篇	三〇
美女篇	三
白馬篇	三
苦思行	三
升天行	三
五遊	三
遠遊篇	四
仙人篇	四